

2004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 中国最佳

王蒙 主编

林建法 选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 中篇小说



2004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 中国最佳 中篇小说

---

王 蒙 主编

林建法 选编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 林建法 20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4 中国最佳中篇小说/林建法选编.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5. 2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王蒙主编)

ISBN 7-205-05825-2

I. 2… II. 林… III.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9582 号

---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 丹东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幅面尺寸: 146mm × 208mm

印张: 20

字数: 490 千字

印数: 1~8,000

印刷时间: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出版时间: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责任编辑: 陶然

封面设计: 杜江

责任校对: 韩毅

---

定 价: 31.00 元

销售热线: 024-23284300

23284296

#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 蒙

编 委 张中行 林 非 叶延滨

王得后 张东平 孙 郁

中篇小说卷 林建法

短篇小说卷 林建法

散文卷 王必胜 潘凯雄

随笔卷 潘凯雄 王必胜

杂文卷 王乾荣

诗歌卷 宗仁发

#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七周年版

《2004 中国最佳散文》

《2004 中国最佳随笔》

《2004 中国最佳诗歌》

《2004 中国最佳杂文》

《2004 中国最佳中篇小说》

《2004 中国最佳短篇小说》

本丛书编委会从五大文学门类  
汇聚文坛权威选家，广选、精编、集评。

及时发布上年度最有代表性的  
原创作品。为读者提供极具研究与  
保留价值、蕴涵文学精髓的优选本，  
卷首序言更见功力。

自 1998 年至现在七年最佳选  
本的发布，已使本丛书成为读者眼  
中有别于其他选本的、极具特色的  
民间选本。

本丛书将继续坚持“民间立场、  
民间态度、民间选本”的编辑宗旨，  
提供文坛名副其实的一流选本。

洪治纲

## 谎言是何等的楚楚动人

如果小说是一种谎言，那么，小说家就是一个让话语行走在谎言世界里的人。这并没有什么不对。因为谎言并非只是恶俗的欺骗，它同样也是安顿灵魂的一种方式。尤其是那些来自精神深处的谎言，或许与我们所终日注视的现实相距甚远，但是，它可以为我们的灵魂提供一个虚拟的空间，让我们稍安勿躁，静心地漫游于另一个隐秘的世界里，独享生命的爱恨情仇，为自己的心智而活，并活出另一种芬芳。所以，普鲁斯特曾经直言不讳地说：“谎言，完美的谎言，关于我们所知道的人们、我们与他们之间曾经拥有的关系，以及我们的某些行为动机，由我们使用完全不同的话语编织而成的、关于我们是什么、我们爱谁，以及在涉及那些爱我们并且由于早、中、晚不断地与我们亲吻问候而在心目中把我们美化的人们时，我们是如何感受谎言的——这种谎言是世界上鲜见的几种可以为我们打开窗子、给我们引见什么是新的和未知的世界的东西，它可以唤醒我们对世界懵懂的沉思，否则，这些我们将永远都不会知道。”普鲁斯特的这番话颇有意味。他似乎更相信，特殊的谎言可以为我们打开懵懂的窗户，让我们看到那些未知的世界，并唤醒我们的认知能力。

我对普氏的这番话可谓心有戚戚焉。理由非常简单，如果现实本身已经告诉了我们一切，我们何必还要通过小说去重新复述它们？仅仅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如果是这样，庞大的资讯时代可以轻松地解决了。但是，另一种情形是，我们的很多

作家却始终被文学的真实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的真实，经验的真实，人性的真实……真实像一位深爱而不得的情人，总是盘旋在他们的内心，使他们面对疯狂的想象和激情，每每显得忍气吞声，甚至见到“谎言”二字，便立即绕道而行。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是，很多作家都标榜自己要成为物欲时代的“最后一个精神贵族”，可是，真正的“贵族”精神却依然离他们渐行渐远。

我这样说，并非武断。因为一个显在的事实是，我们的作家中很少有人对“谎言”给予应有的尊重，也很少有人对“可能性的生活”给予倾心倾力的关注。大多数人始终在追求现实生活的意义，追求“真实”的意义，而这些意义在很多时候又都悬置在充满悖论的天空中，成为人类文明的一种永远的痛与尴尬。因此，我对这种“意义过度”的写作常常感到怀疑。它裸露在外在的，通常是思考的向度，是价值的取舍，是作家对现实的感愤和忧思，而不是精神漫游的动人姿态，不是话语在智性营构中的妙曼之舞。换言之，这是一种“此岸”的写作，缺少对“彼岸”的想象和观照，不能从“彼岸”的角度来“唤醒我们对世界懵懂的沉思”。所以，在我的阅读视野里，近些年的文坛总是呈现出一种慵懶的姿态，很少有作品能够引领我们的灵魂去飞翔，能够让我们在“谎言的世界”里返观自身的生存以及现代人的内心焦灼。

在这种背景下，中篇小说创作的总体态势也大抵如此。回顾2004年的中篇小说，仅我所读到的一些作品，大多数仍缠绕在“真实”的圭臬之中，或者说，仍沉迷于对现实意义的追问。撇开那些典型的社会问题小说，仅就一些具有精神思考的作品而言，譬如，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池莉的《托尔斯泰围巾》，映川的《我困了，我醒了》，叶弥的《小女人》，陈希我的《晒月亮》，北北的《亲爱的哥哥》，陈继明的《恐龙》，温亚军的《手心手背》……等等，似乎都没能真正地进

入“彼岸”的世界。不错，这些作品并不缺乏“好看”的魅力，也不时地给我们以“感动”，然而，它们却难以激起我们心智上的对视和交流，难以为我们提供某种怀想的空间。

当然，例外也不是绝对的没有，只是不多而已。当林建法先生向我提供这份年选的作品目录时，我惊喜地发现，那些曾引起我美好体验的作品，也赫然列于其中。我不知道，这是我们共同的审美趣味所致？还是我们都已不堪忍受“真实”的折磨？抑或“完美的谎言”更能迅猛地抵达我们期待已久的内心地带？

在2004年的中篇小说里，首先激起我心智愉悦并构成审美挑战的，是刁斗的《身份》、苏炜的《米调》、王璞的《啤酒》、韩少功的《山歌天上来》和陈昌平的《国家机密》。在我看来，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地坚信“谎言”的力量，并对“谎言”给予了合理的尊重。它们自觉地将“谎言”视为创作主体展示生命情态和审美理想的重要方式，以“完美的谎言”作为人物行动的理想和信念，让他们异常执著地沿着这种虚幻的精神目标奔跑着，抗争着，期待着，从而有效地打开了某些人类隐秘的精神景观，凸现了另一种可能性的生活状态。譬如刁斗的《身份》通过对人物身份的有效剥离，重新审视了一个人在失去合法性身份之后所陷入的一系列困境。小说中的于非愚（鱼非鱼？）在一次漫长的出差归来之后，发现另一个“于非愚”已鸠占鹊巢——他打往自己家里的电话总是空号；他回到自己的家里，却被另一个长像相似的“于非愚”和妻子任杰联手驱逐出家门；他寄居在朋友张巍的家中，可是张巍最后也认为他是个假的于非愚；他来到自己的工作单位，结果办公室早被那个“于非愚”占领；他们跑到学校找儿子求证，但是儿子也极不信任他；他跑回老家找父母求证，父母却将他视为自己的堂弟于飞龙；他四处寻找工作赖以糊口，结果又因为身份证被扣而走投无路。这里，刁斗以一种相当游离的叙事话语，设



置了另一个看似相像的“于非愚”（于飞龙？），让他轻松地取代了于非愚所拥有的一切：家庭，工作，亲人，社会关系，乃至最基本的生存权，并使于非愚彻底地失去了一切求证自我身份的机会，成为强奸犯于飞龙的替身而活。显然，《身份》并不只是想探究一个人无法回归自己的痛苦和尴尬，它的重心在于，作者试图通过对我们日常生活中被充分符号化的“身份”的消解，在一种“谎言”式的推衍中，重新打开我们存在的现实空间，尤其是这种现实空间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脆弱特性。因为，小说带给我们的伤痛并不在于于非愚的命运从此被彻底改写，而是在这一改写的过程中，妻子，儿子，父母，朋友，同事……所有这些让他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都因为一个貌似于非愚的存在，而无一例外地取消了他对自我身份的求证权利。事实上，刁斗在本年度的另一个中篇《的》中，也同样表达了自己对个人身份的这种怀疑。

苏炜的《米调》也涉及一个身份的确认问题。只是主人公米调身份的遗失，不是因为另一个似是而非的“米调”的存在，而是历史的政治强权成功挤压的结果。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一群狂热的红卫兵干将置身于南方的丛林之中，带着“解放全人类”的“纯粹革命”之理想，与各种武斗派别进行你死我活的游击战，以至于最后分崩离析，各奔东西。其中，米调与廖冰虹产生了爱情，但是最终却被“革命”的炮火摧毁。作者围绕着情爱双方的彼此寻找和等待，在当下的现实境域中展开了一场有关理想与激情的顽强奔走。尽管这篇小说的叙事话语显得颇为滞涩，并在麦克的叙述视角控制下不时地出现游离情形，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整个小说的“谎言”质地——无论是米调在沙漠中漫无目标的流浪，还是廖冰虹在大漠深处的执着寻找，他们似乎不仅仅是为了那段炽烈的情爱，还有对昔日理想生命的尊重，对青春激情的膜拜，对顽强信念的坚守。不错，这些目标已经被历史淘洗殆尽，甚至成为一种

荒诞的存在，而且对他们当下和以后的生活都失去了任何形而下的意义，但是，他们都不曾放弃，因为那是他们生命里曾经闪耀的辉煌，是他们灵魂得以升华的至高之境。这也就是说，《米调》实质上仍然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性叙事，它让那种执著、强悍、豪迈、激越的记忆重新回到极度物欲的现实之中，使这种近乎乌托邦式的理想情怀散发出虽旧犹新的生命之光。或许作者也意识到了这种纯粹的精神寻求，将不可能使米调的身份重新得到确认，所以，米调对廖冰虹的期待总是显得游移不定，而且在故事的结尾，作者让廖冰虹与米调再次失之交臂，只留下寻找和等待仍在继续。

如果说《米调》中的寻找是人物为了自我身份的确认，为了往日激情与理想的确认，那么，王璞《啤酒》中的寻找则是人物为了真正爱情的确认。“我用一生的爱去寻找一个家”，这句流行歌词其实就是整个小说的精神性主题。在1976年这一特殊的历史片段，在举目无亲的北京车站，在饥寒交加的困顿之时，17岁的少女“我”首次与啤酒邂逅，与哈尔滨红肠邂逅，与一个高大质朴的男人张山邂逅，从此，啤酒和张山，便成为她生命的终极之旅，也是她灵魂的栖息之地。作者好就好在，她择取了一个十分合理的叙述视角，通过主人公“我”的激情式复述，凸现了人物灵魂深处的梦想与信念，真爱与归宿。从整个故事的设置来说，作者让人物始终处于行走的状态，体验的状态，感知的状态，从时间到空间，都在不断地频繁交换。其中，既有“文革”历史的家庭劫难，又有现实欲望的反复引诱；既有心灵火星的不断碰撞，又有永不放弃的期待。它们贯穿于“我”的寻找过程中，仿佛一个巨大而又虚空的信念，迫使“我”不停地出发，回归，再出发，再回归。这也恰恰构成了这篇小说纯精神性叙事的重要内核，并展现了它在“谎言”中滑行的全部魅力。因为，“我”的全部愿望就是为了找到张山，并要在张山的生命里体味啤酒的至纯至高之

境，而张山只是“我”在少女时期的一个过客，一个幻影，一个醒不过来的梦。由此，“我”此后的爱恨情仇，分分合合，都是为了求证这个梦，都是为了复活这个幻影，都是为了给隐秘的灵魂安顿一个“家”。虽然它不可能实现，但是它毕竟成就了“我”的一次次激情。

这种纯精神性的叙事，在韩少功的《山歌天上来》中也同样得到了极力彰显。说实在的，自从《马桥辞典》之后，韩少功的小说似乎越来越走向理性，越来越痴迷于“思想”的过度裸露，包括他的《暗示》，《兄弟之间》，以及本年度的一些短篇《801室故事》、《月光两题》等，都有理性被过度表达的嫌疑。但是，《山歌天上来》却显得相当飘逸，呈现出一种特有的虚幻之美。尽管小说采用的仍是一种两极背反的思维构架，即，将一个民间歌王置入疯癫与天才之间，让他以一个生活中的癫狂者和精神上的卓越者穿行于历史与艺术之间，但是，在情节推衍的过程中，韩少功还是充分发挥了一个成熟作家的娴熟技艺，将毛三寅这个七分天才、三分猖狂的民间歌王演绎得鲜活异常。这篇小说之所以让人感奋，我以为并不在于毛三寅性格的狂放与乖张，而在于政治化和功利化的历史如何利用自身特有的权利，诡秘而又毫不留情地褫夺了他的梦想，扼杀了他的艺术天才。这是一种历史强权与自由灵魂的对视和搏斗，也是一种绝对形而下的欲望与绝对形而上的精神的对视和搏斗。颇似徐渭的毛三寅，从本质上说，只是一个为精神而活的人，一个为音乐而活的人，也是一个无法适应人间烟火的人，因此，面对现实生存秩序以及内在的各种关系，他总是保持着种种荒诞式的反抗姿态。但历史强权以及人性欲望不可能让他有反败为胜的机会，所以他的非凡才情总是被羞辱、被利用、被侵吞、被出卖，他的命运也因此被捉弄、被嘲讽、被挤压。这里，韩少功为了展示对天才的某种必要的敬畏，特地安置了两个重要的女性角色，一是毛三寅的妻子，一是芹姐，她

们由外到内，通过至死无悔的挚爱和惊心动魄的哭丧，共同完成了毛三寅内在精神的升华，同时也凄苦无奈地见证了一个天才被历史所轻松地抹杀。毛三寅像一个自由自在的歌魔，流星般地出现和消失，却照见了尘世中许多人性的卑琐和萎顿。

与《山歌天上来》中的毛三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陈昌平《国家机密》中的主人公王爱娇。王爱娇只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年，生于贫民窟中，游走于破败的街巷，接受着那一代人共同的文化启蒙。但是，由于自己的一系列梦境无意中与非理性的历史构成了某种潜在的呼应关系，导致了这位天真的少年从此再也无法分享生命的正常快乐，而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个预言符号。在这个过程中，陈昌平不仅通过梦境的发现和联想，展示了从于主任到省委大院里的首长等一系列权力人物焦灼而又敏感的复杂心态，凸现了他们在变幻不定的历史境域中逐渐失控的尴尬，使人们看到历史的荒谬与人性的荒谬相互渗透后所形成的悖谬景观，而且还以此作为内驱力，进一步剥离了小小的王爱娇的自然生命特质，使他的身心备受折磨。这篇小说看似演绎了一个多少有点特异功能式的少年的神秘梦境，但是，细读之中，我们会发现，他并不像韩少功笔下的毛三寅那样真正具有某种天才的膂力。也就是说，他的神性气质并不突出，相反却处处显露了生命的自然景象。但是，当于主任以荒谬的权力话语向不谙世事的王爱娇宣布了四项纪律时，尤其是其中的第一条便是“王爱娇同学的梦已经被列为国家机密”时，王爱娇的整个生命形式顿时也就变成了一种“国家机密”的符号，而他那生命中的自然属性也因此被强行地抽空了。在这种历史强权的乖张解读中，王爱娇便不再成为王爱娇，他从此失去了少年的天真和浪漫，失去了亲情和自由，也失去了生命成长应有的质色，而只是成为一个历史的风向标，一个被妖魔化了的政治道具。

王松的《红莓花儿开》也讲述了一个有关少年天才的故

事。不过，作者似乎更习惯于那种写实化的叙述，也更乐于对特殊的历史境域中的道德启蒙、政治启蒙和知识启蒙进行反思性的诘问，或者说，王松更喜欢对人物的命运与苦难赋予某种“历史深度”的追问。我以为，这多少影响了这篇小说良好的灵性质地。但是，与王松本年度的其他中篇（如《血凝》、《红风筝》）相比，《红莓花儿开》还是显得更有飞翔的气质。小说中的华大傻和华二傻总是挣脱体制化的教育模式，“看那些与学习无关的书，想那些与学习无关的事”，并且在强烈的好奇心和创造欲中，果然频频地实现了一个少年特有的梦想。王松好就好在，他不自觉地为这两个少年天才营构了一个相对自足的精神世界，那里有梦想，有激情，有追求，有创造，有成功的欣喜，也有失败的巨痛。他们所承受的巨大苦难，不是来自于自己内心的苍白，而是来自于缺乏人性关怀的教育体制和粗暴的家长式老师共同织成的蛮横与武断的教育方式。这种教育方式不是启蒙，而是规训，不是激发，而是扼杀。其实，小说的主题也是向这一方向延伸。这让我尤感不足。我甚至想，如果作者将这种冲突淡化一些，或者在情节处理上更机智一些，让华氏兄弟在“天才”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一点，在虚幻的世界里更疯狂一些，更成功一些，也许小说更具有一种精神上的震撼力和心灵上的冲击力。

上述这些小说，无疑都属于那种精神性极浓的叙事。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与现实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又分明剥离了我们所习惯的“真实”，具有某种奇异甚至荒诞的特质。正是这种特质，不仅将小说成功地推向了各种“可能性”的生活之中，使人物在各自灵魂的漫游中呈现出十分特殊的精神姿态与个性秉赋，使叙述充满了某种“谎言”的魅力，而且也有效地拓展了创作主体的精神通道，折射出作家的创造潜能。

在2004年的中篇小说中，类似这种“谎言式”精神叙事

的作品，还有王瑞芸的《画家与狗》、王祥夫的《找啊找》、须一瓜的《穿过欲望的洒水车》以及艾伟的《水中花》、鬼子的《大年夜》等。《画家与狗》之所以具有某种“谎言式”的纯精神性意味，就在于作者通过一条叫鲍蓓的母狗，对“狗道”进行了惊心动魄的维护，在“狗道”与“人道”、“兽性”与“人性”的彼此衬托中，展示了我们人类中渐至淡漠甚至丧失的人性与人道。尽管这篇小说在故事的裁剪和节奏的安排上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繁琐和平抑的倾向，但是，作者在“人道”与“狗道”的双向推进过程中，并没有采用那种庸常的一贬一褒的思维，而是通过人与狗的相互感应、相互依恋，在隐秘的精神层面上达成了高度的和谐。在小说中，一位落魄的画家道光与一条流浪的母狗鲍蓓，从最初的同情到后来的慰藉，再到内心的感恩，然后到最终的彼此依恋，这是一个从常理上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的过程，而在叙述中却成为一种不容质疑的精神走向。鲍蓓的感恩、怜悯、善良、勇敢、坚贞、侠义，成就了人类对美好心灵的向往，也使它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当代英雄”，并由此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沉睡已久的高尚情操。

《找啊找》似乎是一个相当纯粹的现实叙事。但是，在这个极度写实化的故事背后，却仍然凸现出一个乡村女性罕见的精神流程，以及直逼世道人心的强悍之力。已身怀六甲的王淑民在丈夫顾小波久无音讯之后，开始沿着他生前打工的地方进行了漫长而执著的寻找。这种寻找，对故事的发展来说，是一种探谜和揭谜的过程，是展示当下现实中欲望、利益、冷漠如何遮蔽良知、亲情和道义的过程，但是，就主人公王淑民来说，却是一个自我信念顽强坚守的惊心动魄的过程，也是对现实道义、公理乃至人心的控诉和斲伐的过程。“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王淑民在种种没有体恤、没有同情甚至没有尊严的情景中，一次次地寻找、猜测、求证，并非仅仅是为了还原某

种真相，而是为了内心最朴素的爱——为了使即将出生的孩子看到自己的爹，为了使身为女人的自己成为丈夫的欣慰，为了梦寐以求的家变得完整而踏实。而这一切最基本的愿望，最后却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和伤痛。顾小波不仅早就成了利益至上的牺牲品，而且成了无知和冷酷的牺牲品。他从小说的一开始就是一个空洞的存在，是妻子王淑民永远也追不到的一个至伤至痛的梦，是极度崩落的世道与人情的有力见证。

须一瓜的《穿过欲望的洒水车》同样也是讲述了妻子寻找丈夫的故事。不过，须一瓜的叙事更显灵性，也更注重对人物精神纯粹性的展示。作者巧妙地回避了直接寻找的过程，而是让话语始终贴着妻子和欢的内心前行，并使“寻找”在更多的时候变成了一种等待和守候，变成了人物对绝望情绪的自我排遣和对希望的一次次自我预设。在小说中，那辆色彩艳丽并充满隐喻意味的洒水车，总是出现在孤独的深夜，穿行在冷漠而又寂静的都市，而驾驶这辆洒水车的人，却同样也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女人，一个没有了丈夫、爱、温暖的少妇，一个融不进都市却又无法剥离都市生活的女人。单调的工作，和她单调的期待一样，都是那么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的无望和压抑。于是，她渴望爆发，渴望冲动，渴望反抗——她以歇斯底里的方式，让洒水车的音乐狂嚣不已，在暴烈的水柱中体验爆发的快意；她在深夜的街头寻求孤独的同类，让痛苦的灵魂彼此获得安慰；她一次次通过私人侦探，想找到自己失踪的丈夫，找到自己的家，找到一个女人一生的梦，却又因为囊中不丰而痛苦地放弃。她渴望真相却又畏惧真相，而当真相最终来临，当她面对丈夫祝安的遗物确认无疑之后，作者并没有极力地叙写和欢的悲情，而只是看似轻描淡写地叙述道：“和欢身子忽然摇晃了一下”——长达数年的苦苦期待，爱、家庭和希望从此崩毁，因此，这“摇晃”之中，又分明蕴藏了生命绝灭般的至痛，但它却被人物极度坚韧的个性秉赋所成功地控制了。这是

叙述的力量，也是人物内心的力量。鬼子的《大年夜》则干脆借鬼魂的游走，在一种隐秘而又无处不在的视角移动中，展示了一个苦涩、无助而又乖张的底层人莫高粱的悲剧性命运。它以一个荒诞的叙事结构，将人性中那些看似并不尖利的卑微，慢慢地堆砌成一个巨大的、令所有人都绕不过去的精神磐石，使小说在追问世道人情的过程中，凸现出罕见的锐利和敏捷。艾伟的《水中花》也是如此。它游离于白天与夜晚之间、现实与幻想之间、表象与内核之间，让一群少年在苍白的现实层面滑行，然后引导他们沿着现实的某些褶皱之处，一步步地深入到被表象掩饰的生存内部，并在荒诞的历史启蒙和少年的英雄梦想中，踏上了看似天真和狂野、其实是无奈与无助的不归路。

迟子建的《草地上的云朵》、王安忆的《临淮关》以及阿成的《纸风车》等作品，虽然在纯粹的精神叙事上着力不是太多，但是，它们也都没有放弃对人物内心虚幻之象的关注。譬如，《草地上的云朵》中，那个精灵般的丑妞，那个始终游走于世俗之外的小小的灵魂，既打开了乡村社会中最为清新、最为质朴、最为自然的一面，又以完美与执拗的死亡终结了大人们恶俗的狂欢。这篇小说的精妙之处，就像《人民文学》第5期的编者留言中所说的那样：“在童稚的眼中照见成人的丑陋，这仅仅是《草地上的云朵》显而易见的一面，另外一面更隐蔽，但更尖锐：那个扛着铁锹的人在原野上流浪，只有他看见了生命是会终结的，人是会死的，他的沉默对小说中那些‘欢乐’的人们构成了尖锐的质疑。”《临淮关》中俊俏而聪明的小杜，在人缘极好的老杜的安排下，从乡村走进城里，由少女步入婚姻，一切看似平淡，但在叙述的肌理之中，却又不时的透射出特有的伦理温情和微妙的情感波动。《纸风车》通过利益、爱情与友情之间的冲突，让萧远和袁侃这对情同手足的大学同学、报社同事陷入到一场空前的较智较力的争斗之



中。尽管这篇小说并没有太多的新鲜成分，作者的艺术思维也显得有些平滑和陈旧，但是，在具体的细节叙述中，它还是不断地突入人物的内心深处，让人们看到了人性中自私、嫉妒、夺利等对友情的盘剥，也使“朋友”这个充满温情的词语变得脆弱不堪。

记得波曼曾说，成为现代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这就是人类在现代性进程中所面临的真实困境，也是我们无法挣脱的生存悖论。面对这种充满了不稳固、不确定、不坚实的现实本体，面对这种终极意义上并不永恒的“真实”，我们的作家似乎更有理由回到“完美的谎言”之中，回到纯粹的精神之中。这样，当我们的灵魂遭受现实的摧毁时，或许还能在虚幻的空间里获得安慰。

2004年11月20日于杭州